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学术价值新论

李 索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 要]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较阮元本更接近于《左传》及杜注原貌,是校正阮本的重要版本;残卷中保存的许多古文、异体字、异文是研究上古文化、汉字构形、汉语词义和语法的宝贵材料,在儒学学术史的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学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2003)01-0138-04

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四万余件手写本和一些木刻本文献中的大部分已被英、法、俄、日“探险者”掠走。其中,“最具学术研究价值的佛经以外的文献,其重要部分则多为英、法两国所收藏”^[1]。从上世纪20年代起,敦煌文献尤其是其中的非佛经文献的巨大学术价值便日益被海内外学者所认同,陆续出版、发表了大量的整理研究专著和论文,其中最引人注目、研究最广泛、成果最多的当属反映晋、隋、唐社会状况的历史和经济类文书。近二三十年来,文献所载的唐代俗文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我们注意到,敦煌文献中还有千余件、一百余种中国传统典籍。对此类文献的部分写本(主要是法国人伯希和所掠者)的研究自上世纪初起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等一批著名学者即着手进行,但总体上看相对冷寂得多。据我们调查,目前所整理出来的英、法、俄藏等敦煌文献中,《春秋经传集解》(残卷)近40件^①,但由于收藏者的“幽闭”政策导致公布较晚及种种原因^[2],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的整理、研究多属概言、举例性质,尚未全面校理。其学术价值尽管前贤有

所提及,但未见专门论证者。

我们认为,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版本学价值

当今流行的《春秋经传集解》以清·阮元所校《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为最。阮氏所依据的底本为宋刻本,所用校本除唐石经外主要为宋、明版本。故《左传》原文及杜注中的“古文”、“本字”多被改写。对此,清儒段玉裁在为《说文解字》“彳反,《春秋传》返从彳”作注时,曾慨叹:“《汉书》曰:‘左氏多古字古言’,许亦云:‘左丘明述《春秋传》以古文’。今左氏无‘彳反’字者,转写改易尽矣。”^{[3](72页)}阮元在校订《春秋左传注疏》时也深感:“班孟坚所谓多古字古言,许叔重所谓述《春秋传》用古文者,年代绵邈,不可究悉。”^[4]然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多为六朝、隋所抄,尽管抄写者水平参差,有诸多不“规范”之处,但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其早于宋本数百年,从而免去了这数百年的辗转抄袭改易之误,从理论上讲更接近原本真迹。今日所存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

① 参阅《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法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黄永武编《敦煌宝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收稿日期] 2002-09-15

[作者简介] 李索(1954-),男,河北辛集市人,河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语史。现为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

(残卷)中就保存了部分“古文”、“本字”，这对于恢复《左传》及杜注之原貌，略补段氏及今日学术界之憾，就显得弥足珍贵。如：

礼：“君子谓叔侯于是知礼”、“于礼不亦远乎”(伯3729号《昭公五年》传文)，“宋公子鲍礼于国人”(斯·85《文公十六年》传文)，“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懲無礼也”(斯·3345《襄公十九年》传文)四“礼”字，阮本皆作“禮”。《说文·示部》：“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豐，豐亦声。礼，古文禮。”^{[5](7页)}《说文解字系传·示部》：“礼，古文禮。臣锴以为：乙，始也。礼之始之。又，乙者，所以记识也。”^[6]“礼”作为“禮”之古文，今本先秦典籍中很少见到。然汉碑中，“禮”常作“礼”，如《隶辨》：“礼，孔耽神祠碑：君少治《礼经》。”^[7]《大唐西域记》中亦有用“礼”字者。如《案达罗国》：“然以宿愿未果，遂乖礼谒。”^[8]手写本《春秋经传集解》中古文“礼”字很常见，可证六朝时所见先秦典籍古文“礼”字仍广泛使用，不仅仅是汉碑和俗文学作品。

辞(辭)：“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伯2562号《僖公八年》传文)，“晋人乃辞王子朝，不纳其使”(斯·6258《昭公二十四年》传文)，“韩子辞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辞之。’”(斯·2984《昭公十六年》传文)，“水道不可，吴子辞。”(斯·5857《昭公十三年》传文)，上述四例“辞”和一例“辭”字，阮本均作“辭”。《说文·辛部》“辭，不受也。从辛从受，受辛宜辞之。辞，籀文辭从台。”^{[5](309页)}可见，表示“推辞、拒绝”义时，本字当为“辭”，“辞”为“辭”之籀文。《段注》：“按，经传凡辞让皆作辞说字，固属假借；而学者乃罕知辞让本字。”^{[3](742页)}对“辞”字之构形，《段注》曰：“和悦以却之，故从台。”^{[3](742页)}“和悦以却之”即今之“辞谢”。《说文·言部》：“谢，辞去也。”^{[5](53页)}《段注》：“辞，不受也。《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此谢之本义也。引伸为凡去之称。”^{[3](95页)}而“辭”本义为“说释”、“言辞”。《段注·辛部》：“辭，说也。……言部曰，说者，释也。”^{[3](742页)}可见上述五例手写本是用

古文或本字，阮本使用的是通用之借字。

此类情况尚有不少。此外，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在行文词语方面也有许多不同于阮本，但与金泽文库本、唐石经本、陆德明《释文》等相合之处。如伯2540号《昭公二十七年》传文“夫鄢将师矫子之命，以灭三族。三族，国之良也”。与金泽文库本正同，而阮本“三族”不重复，亦未出校，然据文意当有^[9]。斯·1443《僖公二十三年》传文“天不靖晋国，殆将啓之。”与唐石经等诸多版本相同，阮本“天”后衍“下”字。近代儒学大师刘师培在读了“伯2540号”后赞叹：“使全帙具存，当与金泽文库本媲美矣。”^[9]王重民先生更认为“(从晋初到隋统一时期的写本)所存即便都是残本，也是原书的本来面貌，远胜辑佚本。”^{[10](18页)}

二、校勘学价值

第一，从理论上讲，由于手写本早于阮氏所用底本几百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辗转抄写之讹误，故可以作为校正阮本的重要参考依据。在校理实践中，我们发现有不少地方确实如此。如：

斯·85《文公十五年》传“(晋郤缺以上军、下军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此句阮本作“曰：‘弱，不可以怠。’”无“君”字，亦未出校。然依文意，当以有“君”字为宜。“弱”在《左传》中常指“年幼”，此处“弱”的主语当指“晋灵公”，即“晋灵公年幼。”八年前，晋太子夷皋才在其母亲穆嬴怀中被立为国君。故称其“弱”。晋国将领郤缺以此语告诫众将士，不要因为国君年幼而懈怠。此与晋君及当时情况正合。故有“君”字比无“君”字句意更加明晰。宋巾箱本等及《春秋左传诂》均有“君”字^①。阮本夺“君”字，且失校。

斯·1443《襄公十四年》传“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杜注：“敕戒二子，欲共宴食。”阮本作“欲其宴食。”且未出校。孔疏云：“知是公自敕戒二子，欲共为宴食。宴食者，闲燕无事，召臣与之共食耳。”^{[11](1957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戒食，谓约期与之共食。”^[12]可见，

① 分别见《春秋经传集解》卷第九，《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再版影印本、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九》载《皇清经解续编》卷二百五十八，上海书店版，第1271页。

“其”当为“共”字，阮本误，且失校。

第二，可为前贤的校勘提供有力的佐证材料，使之更加可信。清儒尤其是阮氏等人在校理《春秋经传集解》中，确有许多真知灼见，但学术界也往往见仁见智。敦煌写本可为其提供重要的事实依据，以见其不诬，进而使之成为不刊之论。如斯·85《文公十六年》传文“尽以其宝赐左右而使行”。“而”字阮本作“以”。阮校：“石经、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右以’作‘右而’，是也。”^{[11](1863页)}敦煌本杜注文“以礼自防闲也。”阮本无“自”字。阮校：“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礼’下有‘自’字，是也。”^{[11](1683页)}

三、语言学价值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的语言学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手写本中保存的相当数量的“古文”，无疑是研究中华元典之古文古义及汉字形义关系的极其重要、弥足珍贵的资料。许慎认为：“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5](314-315页)}就《春秋经传集解》而言，由于后人在传抄中多所改易，不仅导致“厥意难得而说”，而且影响了后人对汉字构形理据及形义关系的理解与研究。如前文所举“辞”、“舜”、“礼”字。再如“憾”字，《说文》未收。段玉裁认为“许书有感无憾，《左传》、《汉书》憾多作感”^{[3](513页)}。意即“憾”的意思是由“感”来表示的。但查阮本《春秋左传正义》，传文中“憾”字多达15例，而表示“憾恨”的“感”仅1例。即《昭公十一年》传文“王贪而无信，唯蔡于感”^{[11](2059-2060页)}①。是《说文》失收，段氏臆断，还是实有其事？据今本《左传》不易说清，甚至导致怀疑段说。手写本中表示“憾恨”的“感”的出现，给段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总之，许多只能在《说文解字》等字典辞书中见到的古文，在写本中变成了鲜活的语言事实，这对于汉字构形、词义的研究来说，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其二，手写本中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异体字，这自然也是汉、晋俗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

字作为记录上古社会现象的活化石，其构形往往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现象相关。异体字的存在有利于人们理解和研究与其意义相关的社会现象。如手写本中“葬”字往往作“塋”。“塋”为“葬”之异体字，《说文》有“葬”无“塋”。《说文·艸部》：“葬，藏也。从死在艸中。”^{[5](27页)}析“塋”之构形，上“艸”下“土”，意指尸体上掩杂草，隐于土中。此当然不是初民之葬制。《易·系辞下》：“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13]而当“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13]、施行土葬之后，“塋”字的构形就是合理的了。然何以仍然以“葬”为正字呢？段玉裁认为：“仓颉造字当黄帝时，既易之以棺槨矣，而葬文犹取衣薪，吊文犹依逐肉，反始不忘本也。礼也者，反其所自生。”^{[3](383页)}依段注，“葬”虽造于“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之时，但为了“反始不忘本”，故仍从“艸”；然若依造字时之葬制，从“艸”、“土”，作“塋”，亦合于理也。

此外，异体字的存在还为探讨汉字形体变化的原因，研究汉字演变的规律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对研究汉字发展史及汉字规范化也有重要意义。但以往对敦煌俗字的研究多取材于其他文书、经卷，对手写本传统典籍中的俗字研究较少。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中异体字的整理无疑是传统典籍中俗字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且相对于其它写本而言，手写本经典中的俗字有今文(或正字)可资对照，更利于辨识、研究。

其三，手写本中的异体字还有助于汉语辞书的编纂和订补，既可弥补现行字典辞书收字之不足，又可为其提供更接近于源头的例证。如敦煌写本中“蘇”可作“蓀”，“寇”常作“殺”，现行的《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均失收。“殺”、“求殺”、“问”《汉语大字典》均未举书证；“喰”的源头书证是清人的例句；“灾”，竟然举的是老舍《骆驼祥子》中的例句。这种异体字在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中还有不少。

其四，对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价值。由于是抄写而非独创，故句式上除了主语省略与否外，与今本差异不大。但在虚词运用上却不尽相同，有

① 阮元《校勘记》：“此古字之仅存者。”

的甚至显著不同。如“弗”与“不”、“而”与“以”、“而”与“如”以及“之”、“焉”、“乎”等文言虚词的运用都有所不同,“也”字的使用尤其在杜注中往往超过今本十几倍之多。由于手写本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且出自众人之手,“也”字的大量使用不应是抄写者的手误或个人习惯。这种特殊现象,上世纪初刘师培就曾注意到了^[9],但至今尚未见专门研究者。

四、学术史价值

王重民先生曾指出:“敦煌四部书反映了中国四部书发展的时代特色,也反映着敦煌地方文化发展的情况。”^{[10](16页)}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作为“四部书”的组成部分之一,自然也不例外。从时间上说,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早的形成于南北朝,晚的直到初唐。内容也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春秋经传集解》原本抄卷;一种是节取嘉言懿行以供讽诵或教授童蒙的“节本”,依据编选主题对原文进行删节。第一种有利于研究《左传》在魏晋的研究情况,窥见杜注原貌;第二种或许是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选本,为研究《左传》在民间下层的流传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这两种情况,前贤已有专论^①,兹不赘述。

总之,以“待理之璞玉”喻称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是绝不为过的。

【参考文献】

- [1] 英藏敦煌文献·序言 [Z].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 [2] 王重民. 敦煌文物被盗记 [A]. 敦煌遗书论文集 [C]. 北京:中华书局, 1984.
- [3]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4] 阮元. 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序 [A]. 研经室集·一集·卷第十一 [M]. 四部丛刊本.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2.
- [5] 许慎. 说文解字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3.
- [6] 徐锴. 说文解字系传:卷第一 [M]. 四部丛刊本.
- [7] 顾南原. 隶书大字典(隶辨) [Z]. 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8. 380.
- [8] 大唐西域记:卷第十 [M]. 四部丛刊本.
- [9] 刘师培. 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 [A]. 刘师培全集:第四册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105.
- [10] 王重民. 敦煌四部书六十年 [A]. 敦煌遗书论文集:上编 [C]. 北京:中华书局, 1984. 18.
- [11] 阮元.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 [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0.
- [12]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1010.
- [13] 阮元.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87.

A New Comment on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e Dunhuang Handwriting Copy Chun Qiu Jing Zhuan Ji Jie (Fragmentary)

Li Su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Most of the Dunhuang handwriting copies *Chun Qiu Jing Zhuan Ji Jie* (fragmentary) are written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copy approaches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Zuo Zhuan* and Du Zhu's annotations more than Ruan Yuan's does, for that reason, it is regarded as a very important edition for correcting the latter. At the same time, many ancient writings, variant characters and different words preserved in this fragmentary are not only valuable materials for studying ancient cultu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meaning and grammar of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but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in the research of Confucian academic history.

Key words: Dunhuang handwriting copy; *Chun Qiu Jing Zhuan Ji Jie*; academic value

(责任编辑: 庞 碑)

① 参阅陈铁凡《〈左传〉节本考》,载台湾《大陆》杂志 VOL 41 NO 7 DCT 1970.